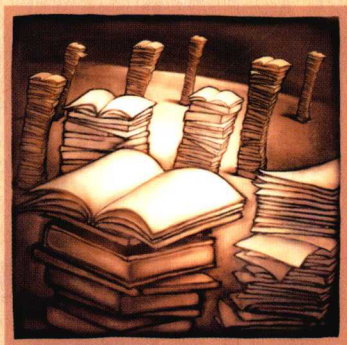


我的编辑之路

编余琐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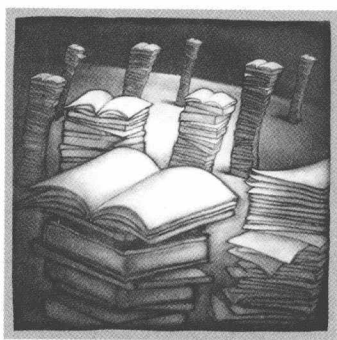


徐兆淮 著

以亲历者的身份，以学者和编辑的眼光，
用近似随笔的文体，
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史、期刊史
提供些许有价值的史料，
为当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留下一些可供回忆的痕迹！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徐兆淮 著

编余琐忆

我的编辑之路

以读者身份，以学者和编辑的眼光，
用近似随笔的文体，
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史、期刊史
提供些许有价值的史料，
为当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留下一些可供回忆的痕迹！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编余琐忆 / 徐兆淮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068-5383-5

I. ①编… II. ①徐…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1152 号

编余琐忆

徐兆淮 著

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

责任编辑 戎 骞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383-5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凌云健笔意纵横

——序徐兆淮《编余琐忆》

丁 帆

徐兆淮先生的《编余琐忆》一书即将付梓，他嘱我为之写一篇序言，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照理说他长我十几岁，应为长辈，晚辈给前辈作序乃为不敬之举，但是，我们相识相知已经35年了，且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是文章合作者，也一起度过了许许多多风风雨雨的日子，因为我十分珍惜和留恋那些青春岁月里的真诚友谊，故沐手提笔，为我的忘年交老友献上一瓣秋日的金桂。

也是1979年的金秋时节，我在栖居于南京大学南园学生宿舍里的许志英先生的房间里见到了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工作的徐兆淮先生，因为许先生喜欢与朋友聊天，这间小屋便成了我们经常海阔天空吹牛的场所。那时我才知道徐兆淮先前也是打算跟随许先生一起调动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来任教的，不知是哪一环出了差池，他就去了出版社。作为一个南京大学中文系1964年毕业的学生，他与许志英先生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共同

度过了“四清”与“文革”时代，二人一起回到家乡，颇有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之意，住的又近，所以常常在一起聊天，我作为一个倾听者，就常常去蹭聊。那时正值思想解放，聊天的核心问题以中国的政局走向为多，间或也谈学术问题，主角当然是许老板，其间也常有以前北京文学所的同事来宁出差在此客串闲聊，俨然成了一个未冠名的俱乐部，直至许先生80年代中期分到住房为止，那间宿舍成了我们永远的记忆。我和兆淮就是在那里开始了文学交流和友谊的航程。

从出版社的文学编辑转至江苏省作家协会的《钟山》杂志，徐兆淮把后半生的精力都倾注于编辑工作，可谓兢兢业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就是在那一时期，我们有了更多的交往，常常为一个稿件讨论数日，尤记得对李杭育的《船长》和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的刊发意见讨论得那么认真，可惜当时他还是副主编，而我们在讨论作品之余，则常常把意见著成文字共同署名发表，所以才有了结集出版的论文集《新时期小说解读》。在那个共同探讨文学作品的日子里，我们的平等交流和无私的争论，成为我人生中不可磨灭的文学记忆，那种毫无功利性的文学作品的讨论，至今看起来似乎显得十分迂腐与可笑了，但是我深深地珍藏在自己的生命的日记之中。

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在扬州工作，每每回宁探望父母时都要与兆淮和许先生聚会聊天，记得是在1985年徐兆淮升任主编的前夕，积极举荐我到《钟山》杂志和他一起工作，其工作调动几乎已经接近完成，记得当时的作协党组书记海啸在中山陵疗养院里接见了我们，对我宣布党组意见：任命我为《钟山》编辑部主任。孰料后来情况突变，我则失去了终生与兆淮共事的机缘。直到1988年，在叶子铭先生、许志英先生和董健先生的合力下，我才得以调进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遂又回到了聊天的俱乐部的环境之中。此乃幸与不幸，自有我们心知肚明也。

兆淮是一个十分认真和勤勉的人，除了撰写大量的文学评论文字外，晚年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往事与故人的回忆之中。从王蒙、李国文、邵燕祥、从维熙、汪曾祺、林斤澜、宗璞、袁鹰、柳萌、阎纲、林希、艾煊、高晓声、陆文夫、张弦、宋词、戴厚英、何士光、杨苡、忆明珠、章品镇、俞律、叶子铭、陈辽这样的老一辈与平辈作家和师长，到晚辈作家王安忆、梁晓声、贾平凹、阎

连科等，他的记叙给上一世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史料，从中我们感受到了一部作品问世与编辑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也是作者在多年办刊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其中许多回眸既往、反思未来的中肯意见实乃当下办刊的宝贵经验之谈，值得办刊者参考借鉴。

兆淮是一个一生老实本分的学人，除了办刊写作，生活要求极低，烟酒不沾，除了看看电视，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甚至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了无情趣的人。殊不知，他一生的坎坷能与谁说呢？除了社会环境因素的不顺外，比如他曾经在作协遭遇过极不公正的待遇，我和许志英先生为之愤愤，力主他在惊慌失措中发起反击！其家庭的种种不幸也使他在时时的痛苦中煎熬，每每想起这些，我都会黯然神伤，默默流泪，所以，我读了他为同事和同乡许志英先生写下的悼文，更能够理解一个同病相怜者借灵堂哭恸惶的心境……写到这里，我已经不能自己了。

几年前兆淮忽得大病，他在病中还坚持写作，努力留下这些文字，其中有些文章发表在我主编的《扬子江评论》上，那一阵，他写一篇我就发一篇，我是想让他尽快地看到这些文章面世，却引起一些人的非议，殊不知其中之良苦用心谁能理解呢？对此我只能报以沉默。

对一个只能用笔写出自己一生经历和思考的学者编辑，我向兆淮致敬！我为此生有叶子铭、许志英、徐兆淮这样的师长和朋友，以及周围一大批同道者陪伴同行而庆幸与自豪，因为我们的心的相通。

我相信，只要尚能动笔，徐兆淮还是会写下去的，除此而外，他又能干什么呢？！

是为序。

◆◆◆目录◆◆◆

一 编余琐忆

002 关于王蒙与稀粥的随想

006 且说李国文的华丽转身

013 邵燕祥与他的“杂文作坊”

019 苦难人生血泪文字

——从维熙印象

024 怀念绍棠

029 汪老与林老：短篇圣手·文坛双璧

——汪曾祺、林斤澜为人文印象

035 问候·祝福·回忆

——宗璞印象记

039 袁鹰与老人写作

044 柳萌：从事业型编辑到编辑型作家

047 阎纲：一位值得敬仰的老编辑

050 林希：一位素未谋面的作家朋友

- 055 我心中的艾煊先生
——写于艾煊逝世八周年纪念之际
- 060 我所知道的高晓声
——写于高晓声逝世 10 周年纪念
- 065 辉煌过后的寂寞
——写于陆文夫逝世 6 周年纪念
- 070 才情相济正当时 情海沉浮已茫然
——忆才子型作家张弦
- 075 才情并茂 诗文双秀
——宋词及其诗文印象
- 081 无法兑现的稿约
——追忆戴厚英二三事
- 083 迟到的问候与谢意
——悼念李肇正
- 086 读者·作家·文友
——杨苾和她编注的《雪泥集》阅读随想
- 092 随意点染皆成趣 任情挥洒味亦浓
——忆明珠散文阅读随想
- 095 史铁生：我所认识的身残心智型作家朋友
- 098 《钟山》与天津作家的姻缘
- 102 且说王安忆与《钟山》的友好合作
- 108 一位灵智长者的精神探索
——何士光与他的《今生》阅读随想

- 114 知青情结与平民情怀
——《知青》与梁晓声为人为文印象
- 119 乡土情结与人文情怀
——阎连科与他的长篇散文阅读随想
- 127 行走在城乡之间 沉潜于乡土情结中
——贾平凹与《定西笔记》阅读印象
- 135 刘坪与《钟山》
——兼谈文学刊物主编的素质与观念
- 141 杂·宽·爱
——老编辑章品镇印象记
- 145 学海沉浮硕果丰
——陈辽其人其文印象
- 149 教师楷模 学者风范
——叶子铭先生印象记
- 153 俞律与文人写作
——读《浮生百记》随想

二 编辑絮语

- 156 主编之难与主编之惑
——期刊主编挨“板子”记
- 163 《钟山》与她的作家朋友
——从《钟山》创刊 20 年作家题词谈起

- 167 从《钟山》编辑部走出来的作家
——兼议作家型编辑与编辑型作家
- 173 期刊定位随想
- 175 文学期刊个性与特色的魅力
- 183 期刊专栏呈异彩
- 185 组稿的艺术
- 189 编辑的最大乐趣
- 192 也谈好编辑
- 194 办刊的酸甜苦辣
- 197 白发编辑话遗憾
- 203 分流：对当前纯文学期刊趋势的思考
- 208 文学期刊的调整大潮
- 213 春风作伴 细雨相依
——且说我的人生职业与事业
- 216 告别《钟山》
- 219 我的学者梦与编辑路（代后记）

关于王蒙与稀粥的随想

作为一名文学期刊的老编辑，委实已有许久未能面见王蒙了。近几年来王蒙到南京讲学或售书时，我也曾想去看望他，但终因诸多不便，而未能遂愿。对此，有时不免有些遗憾。而且据我所知，一些熟识王蒙的朋友，也都在关注着王蒙近期的创作、健康及其忙碌的身影。

尽管如此，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老编辑，与王蒙的结识、相交经历，直到现在依旧在我脑海里清晰可见，印象颇深。盖因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在作家与期刊、编辑共建共存的文学史关系中，如果说一批“右派”作家乃是《钟山》作者队伍的主力军，那么，北京的王蒙、李国文、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南京的高晓声、陆文夫、张弦、艾煊等，便是《钟山》十分倚重的作家之一。而《钟山》和我与这批“右派”作家的友好合作，又正是建立在相同或相近的文学观念之上的。记得王蒙在《钟山》创刊30周年时曾题词“钟山美景三十年”。我以为，这既是对《钟山》的热情鼓励，也可以说是作家与刊物之间知音效应的结果。而1991年，王蒙为短篇《坚硬的稀粥》打那场关于粥的官司时，赠书、致信于我，当也是作家与刊物的友情显示。

诚然，新时期以来，作家与刊物之间的双向选择，都为作家与刊物、与编辑的友好往来，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自上世纪末，王蒙从新疆伊犁河谷返回北京住在招待所，我与他见面初识，到去他迁居光明楼、前门大街的新址约稿，再到东四小胡同四合院的生日拜访、席间叙谈，都一一镌刻在我的脑际，尤其是他较早地应约在《钟山》“作家之窗”上发表中篇小说《风息浪止》，再到他夫妇俩应邀来宁访问，我陪同他们参观雨花台烈士陵园，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作为编辑、朋友或是读者，我都会不时地忆念起我所熟悉的作家和他

们的作品。恰巧的是，近日翻检旧时书札，忽而见到一本王蒙亲笔题签赠我的《粥》文学集和两封简短信函。闲暇时随意翻检浏览，竟不仅生出一些关于粥的联想，而且还追忆起与王蒙的某些交往经历。自觉这些陈年的细屑小事虽无多大史料价值，于我倒也不乏纪念意义，特小记于下。

随意翻阅这本 17 年前出版的《粥》文学集，忽而发现，除了题词“兆淮同志一笑”颇令人玩味之外，这本只有 14 万字的小册子竟收录王蒙关于稀粥的四篇文章，关于《坚硬的稀粥》的 10 篇争鸣文章，另收集了 19 位作家 21 篇关于粥的随笔。此书本缘起于王蒙的一篇寓意多重的讽喻小说，由小说引起文坛争论并不奇怪，再由争论而演绎出一场诉讼官司，这就有些令人惊诧了。更令人怪异的是，在这争论前后，竟唤起全国近 20 位著名作家、学者撰文就粥的话题洋洋洒洒地写作了 20 多篇随笔，而且这些随笔或考古议今，或意趣盎然，读之颇给人以旁征博引、痛快淋漓之感。明明是有所指向，并非无病呻吟，却又偏偏一字不提小说争论之事。难怪张洁在《潇洒稀粥》一文结尾处说：“无论如何，1991 年稀粥年是稀粥史上值得记载的一年。”也难怪有人如此概括沸沸扬扬的粥年：粥文传中国，粥话满中华。

就我的饮食习惯而言，说到稀粥，首先唤起的，便是我个人关于粥的记忆与体验。起初年少时，在我的印象里稀粥总与贫穷摆脱不了干系。幼时家贫，在农村常常是早晚喝大麦粥（又名罕子粥），中午吃菜稀饭或菜干饭。及至解放后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跨入首都中央级研究机构的大门，仍然要经常喝玉米粥、吃窝窝头，那时，我方才醒悟到，原来告别稀饭与告别贫穷一样，毕竟不是靠空喊几句革命口号就能一蹴而就的。

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勃兴，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之后，生活方式生活观念起了较大变化之时，告别稀饭加咸菜这才有了可能。即使偶尔在连续享用丰裕美食之后，出于调剂口味，或是满足忆旧之需，想喝稀粥，那再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稀饭加咸菜，而大都变成了名目繁多的美味粥：肉粥、鸡粥、鱼粥、虾粥、海鲜粥、皮蛋粥等等。在告别稀粥多年之后，人们又常常不免怀念起稀粥来。每每在旅行归来时，我常让家人给我熬点小米稀粥，外加酱黄瓜。吃起来特别爽口。可见，尽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粥也处于变化之中，但不管怎样变化，中国人仍然忘不了稀粥。

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末，我作为《钟山》编辑去北京陈建功家组稿，他不正

一次地亲自为我做海鲜粥，吃得我满口生津，直呼过瘾。前两年有两位京中朋友来宁，我即学建功之法，招待他们喝粥，只不过已不是我在家操持，而是请客人到潮州粥店撮了一顿虾米鱼粥。结果此举也赢得了客人的首肯与称赞。

看来，在古今中国，无论贫富，也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大约人人都有过关于粥的记忆与体验，都有说不完的话语。于是，我想，或许稀粥原本就是中国独特的餐饮文化的组成部分，与贫富贵贱并无多少直接的干系。可知，由小说引发的那场关于粥的争论，虽然看起来不免有点闹剧的意味，但闹剧的背后，却也似乎隐藏着、关涉到时代思潮的走向。那种动辄给人戴政治帽子、搞影射批判的做法，毕竟不大时兴了。

关于这场因粥而起的争论，如今已逝去了近二十年，成为一段尘封已久的文坛历史。应当说，这桩发生在90年代初期闹得沸沸扬扬的文坛风波，其开场与收场方式，是颇为耐人寻味和微妙复杂的。随着时间的变迁，孰是孰非，功过评判，也许已经无关紧要，更重要的是，如今的王蒙仍有一定的创作活力。那篇寓意丰满的讽喻小说，即使如今读来，仍能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仍有相当的生命力。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面对那些强加于人的粗暴武断的批评，作家毕竟可以选择拿起笔甚至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无论如何，这是值得庆幸的。

其实，《粥》文学集与其说是一本关于王蒙小说《坚硬的稀粥》的争论集，倒不如说是一本关于粥的随笔集。或者说，这本随笔集，皆因对王蒙的小说的争鸣而引发的关于粥的话题，因而取名争鸣集也无不可。然而，王蒙就是王蒙，他能机智地把对其小说严肃的政治批判化作一场嬉笑怒骂的玩笑。而其他写随笔的作家虽然只谈粥，不提王蒙及其小说，却又巧妙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文学观念。真可谓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是王蒙及其撰写随笔的作家朋友的聪明与机智之处，也应看作是时代的进步、政治的文明，为作家的创作自由提供了某种可能。记得王蒙常喜欢说，现在是作家创作的“黄金时代”“最好时期”，或许正基于此。

作为一名当代文学期刊的老编辑，我自然十分清楚王蒙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作品的分量：他的生平历经坎坷，屡遭挫折，但像他那样先后荣获全国性短篇奖三次、中篇奖两次，长篇《活动变人形》又颇具影响力，且身兼作家、评论家、学者、编辑的几重身份，就作品数量之大、变化之多、题材之广而言，实可称之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从童年时企盼告别稀粥到如今老年怀念稀粥，时光已经走过了70年。从《粥》

文学集记载的那场关于粥的争论，到如今也已过去近二十年。眼下，我和同辈的文学同仁们无不庆幸时代的进步，文学的发展。仿佛记得早在1983年全国作代会之后，王蒙就在不断欢呼文学的“黄金时代”和“最好时光”尽快到来。倘从王蒙能安全度过一次次“危机时刻”来看，自然值得庆幸，但真正的文学创作“黄金时刻”何时到来，恐怕还需待以时日。不知王蒙先生可以为然？

且说李国文的华丽转身

因为眼疾体衰，已有许久不读虚构体的小说了，我把有限的阅读兴趣，更多地转向纪实体解密性的作品，还有亲历性的散文随笔了。这情形恰如李国文近十几年来不再写小说，而把笔力转向了为期刊专栏写文史类随笔一样。因为退休多年，也有许久未能面见到李国文了。无论是作为他的作品的责编朋友，还是作为他的作品的读者，有时还真怪想念他的。而对我来说，最便利见到他和他作品的方式，便是翻阅手头的那本杂志——《文学自由谈》。因为我知道，他作为这家刊物的特约专栏作家，似乎已有十多年了。此外，便是偶尔翻检到昔日他给我的信件，和刊发在《钟山》上的作品。

凡是阅读《文学自由谈》的人，总喜欢首先翻阅李国文为期刊所写的特约专栏稿件。年底闲暇，偶尔之间翻阅 2009 年第 2 期《文学自由谈》，不由地就被封面上那幅白发老人的照片所吸引住了。脑海里顿时浮现的印象便是：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一位温文尔雅的文人。展现在我眼前的这位老人，有着硕大的脑袋，稀疏的白发，慈善的面孔上，那睿智的目光里，闪耀着博识与才情，贮满了人生的磨难与艰辛。

他就是我和《钟山》所熟悉的作家朋友李国文。按理说，我们的相识并不算早，那只不过是新时期初始的时候。1957 年“反右”运动时，当 27 岁的李国文因短篇《改选》获罪被错划为“右派”之际，我只不过是一个不到 18 岁的中学生。当时我或许听说过王蒙和刘绍棠之名，却不知李国文其人其名。直到二十多年后，国文平反并旋即以《月食》和《冬天里的春天》震响文坛之时，作为刚刚创办不久的《钟山》的编辑，我这才有了结识国文并向他约稿的机会。当然，约稿之前，我除了拜读过他的短篇《月食》之外，已得知他祖籍江苏盐城，生于上海，在南

京读过国立戏专。上世纪80年代初，国文已是全国著名作家，而《钟山》不过是个省级地方刊物，我只不过是个毫不知名的文学编辑。当时初为编辑的我，首先想到的约稿方式只能是打乡情牌，以家乡刊物之名来京约请家乡作家为《钟山》写稿，寄希望于以乡情打动作家。

大约在1980年初《月食》发表不久，我即去北京国文家里作拜访性约稿。那时，国文家尚住在复兴门外铁一区一条不甚宽敞的小巷里，家里似乎只有国文夫妇俩人。除了书房雅致整洁，充满书卷气，给我印象尤深之外，只见那时的国文大约五十来岁，身板健硕，红光满面，言行敏捷，待人热情宽厚。几乎很难看出这位当年被错划成“右派”，流放铁路工地长期从事强体力劳动的痕迹。当我亮明身份，以家乡刊物编辑之名义热情约稿之时，他先是询问了江苏一些作家朋友，尤其是陆文夫和高晓声等人的情况，然后便谦称自己作品一向不多，一时间很难应允何时供稿。我知道，像他这样知名度的作家约稿者甚多，而他的创作数量又有限；我也能感受到国文委实是个热情坦诚、创作态度严谨的作家，第一次上门约稿，初次相识，是不大可能携稿而回、满载而归的。我需要更大的热诚与耐心，也需要以更为有效的组稿方式才能尽快地组约到他的作品。

第二年，当我再去国文家约稿时，我是带着一位我与国文共同认识的评论界朋友和一份新的约稿“合同”去的，这位评论家就是我在文学所十年“文革”中的“战友”何文轩（西来）。我的约稿“合同”，自然不是优厚的稿酬——那时候，期刊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大都不是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而主要是靠友情和信任度来维系的。我的所谓约稿“合同”便是以“作家之窗”专栏来吸引作家，或者说以此专栏作诱饵来“钓”名作家的胃口——这专栏除了发名作家的新作之外，还同时发表著名评论家对作家及新作的评论文章，此外，还附有该作家的小传、作品目录。透过这专栏的窗口，即可获得该作家与作品的许多重要信息。因而，这一专栏创办不久，不仅受到作家、读者和文学界的众目关注，且较快地扩大了期刊的影响，丰富了稿源。

当然，伴随着这一专栏的设置，还有我对像李国文这些“右派”们的生活经历的尊重与理解，对他们所持文学主张与文学精神的赞同。据我所知，国文在1957年那场政治劫难之后，旋即就被发配边塞的铁路工地，长期从事强体力劳动，有了更多的人生苦难的体验，却失去了从事文学创作的权利。这对于素来喜欢创作的作者来说，其内心的痛苦，自是可想而知的。可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里，